

# 沈寂心目中的“大亨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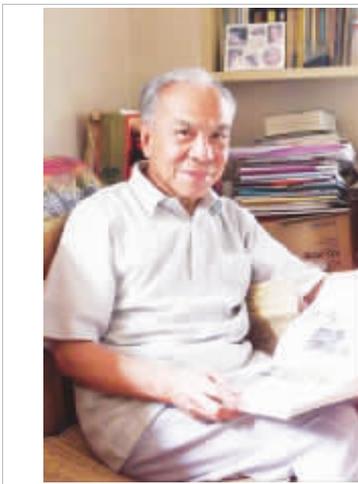
■葛昆元

沈寂是一位情感丰富的作家，嬉笑怒骂、爱恨情仇，常常倾诉于朋友间的交谈之中，充溢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。前些年，我为他撰写《沈寂口述历史》一书时，就经常感受到他那股强烈的情感。

他告诉我，他爱好文学创作得益于他的父亲。虽然他父亲没什么文化，但在他小时候，经常带他去看戏，看电影，培养了他的文学兴趣。但真正引导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却是柯灵先生。

那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沈寂加入新四军与日伪军英勇战斗，后因病从抗日根据地返回上海，考入复旦大学西方文学系。他和同学王树平（即著名外交官王殊），慎仪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，出版油印刊物《青的果》，刊出了沈寂写的短篇小说《盗马贼》，以及王树平的散文和慎仪的《曹禺研究》。

一天，沈寂听说著名进步作家柯灵在主编《万象》杂志，就斗胆将《盗马贼》投了过去，至于发表，他不抱希望。然而，仅仅过了一星期，他就收到了柯灵的来信，嘱咐他再写一篇。于是，他马上又写了一篇短篇小说《大草泽的犷悍》寄去。一星期后，柯灵又来信，要他再写一篇。于是，他又根据上海京剧界某些坤伶堕落而引发的凶杀案，写成小说《被玩弄者的报复》寄给柯灵。他认为，柯灵这样做只是在考察他的创作能力。但是，令他十分意外的是，柯灵竟在《万象》杂志上，陆续发表了



沈寂的《大亨》当年是本畅销书。

这三篇小说，并特地请著名画家江栋良为他的《盗马贼》绘插图，还在《编后记》里热情地向读者推荐：“沈寂是文学界的新人，定能引起读者的重视。”这使得沈寂很快成为一名令人瞩目的青年作家。

那天，沈寂捧着刊有自己小说的《万象》杂志，读着柯灵先生的评论，心里十分高兴。但更使他开心的是，凭着《万象》上的这三篇小说，他还获得了宝贵的爱情。当时，沈寂年近二十，热爱文学，渴望爱情，他爱上了一位邻家姑娘。一天，他假装与姑娘在大新公司“邂逅”，给姑娘看了他发表在

《万象》上的小说，同时表达了爱意。姑娘将小说带回家给自己的父亲看了，几天后，姑娘的父亲同意了他和自己女儿的婚事，并举行了订婚仪式。

沈寂说：“没有柯灵在一堆扔掉的废稿中发现我的那篇《盗马贼》，没有他写信鼓励我再写两篇小说寄给他，在《万象》上连续发表我的三篇小说，我就不可能走上文学创作道路。”

有一次，我问沈老：“您已经撰写出版了二十几部文学作品，其中哪一部是您最得意的？”沈寂想都没想，便脱口而出说：“《大亨》。”

“说起《大亨》，要感谢我的老

朋友、《新民晚报》副总编沈毓刚先生。”沈寂感慨地说，“此前，我看了一部香港拍的影片《反毒英雄黄金荣》，完全颠倒黑白，违背事实，胡编乱造，把一个贩毒大流氓，美化成了反毒英雄。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写出一个真实的黄金荣，写出他大肆贩卖毒品、投靠法租界当局、组织帮会、侵吞大世界等恶行，当然也要肯定他抗战中闭门不出、拒当汉奸的史实。”

开始写《黄金荣》后不久，在一次欢迎董鼎山回上海的聚会上，沈毓刚一看到沈寂就“骂”道：“你和我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你给其他报纸写了好多作品，为什么不给我写？”沈寂连忙说：“我现在手里就有一篇写黄金荣的传记，你看看晚报可以连载吧？”

征得领导同意后，沈毓刚将沈寂的《黄金荣》稿子转交给副刊部主任吴承惠在“夜光杯”副刊上连载。吴承惠确是高手，看了作品后对沈寂说：“你的作品名字不太好，就改叫《大亨》吧。”沈寂一听，立即同意，并称赞改得好。随后，吴承惠又提出：“现在作品只有一万多字，你必须一面写，一面登，每个星期你要给我一万多字，每周五交稿。”沈寂高兴地应道：“一言为定！”

刚开始在《新民晚报》连载

时，沈寂还有些担心会不会出问题，可是几天下来，有关方面没什么反应，倒是听说读者蛮喜欢看的。之后，著名漫画家华君武还写信给《新民晚报》说：“沈寂写的不是流氓史，而是一部上海近现代史，别人未写过。”沈寂听说后，写《大亨》的劲头更足了。

当时正值夏季高温，年近六十的沈寂每天在家中的三层阁楼上挥汗写作，没有电风扇，更没有空调，仅靠老虎窗吹进来点风；没有写字台，他就拿块洗衣板，搁在两只凳子上，坐在小竹椅上，赤膊写。夫人不断为他送来冷水里绞干的毛巾，让他擦汗。后来，沈毓刚在文章中称赞沈寂是“阁楼上的赤膊大亨”。

令沈寂高兴的是，每天读《大亨》连载的读者越来越多，许多朋友、同事见了他都直接叫他“大亨”了。就连里弄里那位叫传呼电话的老伯伯，也直接叫他“大亨”去听电话。其间，《新民晚报》还转来杜月笙当年的账房先生黄国栋的来信，使沈寂得以认识他，并从他那里得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素材，顺利写完了连载。

《大亨》连载结束后，长江文艺出版社马上出版了单行本，初版13万册，很快销完，之后再版，成为畅销书。沈寂一直感慨，《大亨》的成功，离不开《新民晚报》领导和广大读者的大力支持与肯定。他还时常说，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柯灵、沈毓刚、吴承惠等人，他将一事无成，这些师友才是他心目中的“大亨”。

# 穆旦佚文《从长沙到武汉》

■杨新宇

4月16日的《文汇读书周报》刊发了汤志辉先生的《新发现穆旦早年佚文（笑话）》。汤志辉的文章提供了穆旦（查良铮）1930年12周岁时发表在《大公报》上的一篇文章《笑话》，但他据以整理的数据库中有字迹不清处，他文章中的“王儿是□□□”这一句，原文是“王儿是很好玩的”。

汤志辉还提到易彬与杨艺嫒在《穆旦集外文五种》中披露的另外两篇穆旦少年时期的文章：《管家的丈夫》和《傻女婿的故事》，这两篇文章都是1933年发表在《益世报·小朋友》上的。

这些习作表明穆旦在少年时期就已经爱好写作了，此外也说明天津《大公报》和《益世报》在当地的影响力。穆旦还曾参与过《大公报》的有奖猜谜活动，1928年3月4日《大公报》刊登的“猜谜揭晓”中，查良铮获了“丙等”，奖品是普通铅笔一支，没能获得“甲等”的“顶好铅笔”和“乙等”的“鸡牌铅笔”。

除了汤志辉、易彬、杨艺嫒等学者提到的集外文外，《穆旦诗文集（增订版）》仍有遗漏，如《从长沙到武汉——还乡记之二》。

《穆旦诗文集（增订版）》所附李方编制的《穆旦（查良铮）年谱》，引用了刘希武的回忆，说抗战胜利后“穆旦随青年军北上回北平，一路上他写了《还乡记》杂文约十篇”，目前《穆旦诗文集（增订版）》中收录有《从昆明到长沙——还乡记》《岁暮的武汉》《从汉口到北平》《回到北平》，正是“冒险家的乐园”等四篇应该属于《还乡记》系列的散文，而且这四篇散文都发表

于《独立周报》，署名都是“本报特派记者查良铮”。这四篇散文，对我们理解穆旦的诗歌或许不能提供多少帮助，但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，提供了历史现场的纪录，描摹了胜利后各处的景象，尤其是复员的艰难，有些历史事实，如日本兵当司机等，读来很是新鲜。同为“九叶诗人”的陈敬容，1946年6月到7月发表在《世界晨报》上的《大江东去》系列散文（其第一篇就叫《复员比逃难还苦》），正好可以与之参看，穆旦到底是占了青年军的光，一路已经舒服多了。但刘希武说“《还乡记》杂文约十篇”，而《穆旦诗文集（增订版）》所收只有区区四篇，两者还是有很大差距。

这几篇《还乡记》系列散文，除了在《独立周报》刊载过外，还曾在《大公晚报》上刊载过，均署名查良铮，其中《从汉口到北平》《回到北平》，正是“冒险家的乐园”两篇，在《大公晚报》上合成了一篇《回到北平》。而1946年1月21日的《大公晚报》上，还刊载有《穆旦诗文集（增订版）》未能收入的《从长沙到武汉——还乡记之二》。补上这一篇，正好从昆明到长沙，到武汉，再坐飞机到北平，穆旦还乡的路程就完整了，特附于下，以供穆旦迷和研究者参考。

## 从长沙到武汉——还乡记之二

从长沙到武汉七百余里，细雨纷纷，满目疮痍，村舍穷苦荒凉，是这一程来最呈现战争苦痛的地方。这一带复员也最不

容易，第一是交通不能畅通。从长沙到武汉的公路，以各处桥梁破坏，不能使用。铁路勉强可以通行，机务仍由日人管理，可是以柴油汽车代火车头，挂上两三个平车的这种轻便火车，每日只能运送三百人而已。在长沙坐火车也要公函，也要登记，等上十多天不见得能够走成的人很多。再有就是水路，冬季水浅，千人的轮船只能抵岳阳，百人的轮船可以行驶长沙岳阳间，并可曳带几只驳船，可是现在军运繁忙，这种船普通人坐不到。一个老百姓若急于返乡，他只有坐木船而下，遇见北风时，至少要在水上飘流五六天，还不说这一途的水警敲诈，水盗打劫！

我们从长沙就坐着汽车拖的小火车出发，车头由日俘驾驶，在铁轨上时时有喇叭发出“八——八”的声音。车头后面是三辆平车，我们把自己带来的汽车放在平车上，人仍旧坐在汽车里面。十二月廿一日阴雨，平车上汽车的四周站满了人，可是沿站还有人央告着要往车上挤。这种情况你闭目可以想见了：男女老幼，都在雨里风里成了一团，堆了一座人山由汽车慢慢的拖。而举目四望呢，荒凉的农村，这里是垒垒弹痕，那里是打翻的火车，破铜烂铁，断桥残壁，表示这里的热闹一时。那热闹的主角也并没有走开，由衡阳沿长沙而至岳阳，这一小段距离中就驻着十一万日本俘虏，一时都无法送回。你可以看见他们散居在沿路的小屋子里。有的冒雨沿着铁路走，看见火车停下就往上扒，有的给打下去了，有的连连敬礼算是得到了

站脚之地。看看四面的残破风景，再看看这主角现在的情况，正是很好的一幅“自作孽”的活绘。

早晨十时由长沙开车，晚九时抵达岳阳，三百多里整整走了一天。是夜非常寒冷，车站上一个人都不见，只有两三个卖面的担子跑来做生意。我们下了车找到一个很脏的店子住下。

被敌人占领了七年的岳阳，简直成了一个空壳。街上杂草丛生，居舍倾倒。人们从山上移回来，居住才不过是一个月的事。有的来自贵阳，盘费用尽，就暂留此地做点小生意。我们住的店子房顶炸光，房主席缝起，四周以木板围住，这风雨不遮的屋子还要我们一千二百元（元）一天！岳阳的房子真太少了。除了西班牙的一所天主堂，和美国红十字会的一个小医院是战前的房子，此外几全是现搭成的泥草蓬而已，岳阳滨于以鱼米著称的洞庭湖，你想想（象）一定是个不坏的地方。实际上它只是三四条街的村落，破落，脏污，物价高贵，而且什么都买不到，我们筹办米粮都要自长沙运来。这里有一个船泊（舶）调配所，所长既嚷无船，又嚷无煤。四方面军大军北调，路过此地，也把地方弄得杂乱无章。

从岳阳到武昌，有大火车可以通行，仍由日俘开车。火车无煤，以木柴代替，不但走得慢，每达一站还得停下，烧柴至半个钟头才能继续开行。因此我们足足走了三十六小时，圣诞节就在车上过去了。我们在车中生起炭火，自己烧饭来吃，因为沿途没有什么东西可买（来）吃的。这一天特别寒冷，白雾盖满了山头，我们夜晚都无法睡眠，朦朦胧胧把时间摇了过去。想不到次日白天仍不能到达，又摇到入夜十二时，方被叫醒，说是到了。逃难的苦我没有尝过，这“复员”的苦，我倒愿意大家也能体会。